

伊戈尔·佐洛图斯基访谈录

任光宣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提 要: 2007年8月4日, 北京大学任光宣教授去莫斯科郊外的别列杰尔金诺(俗称“作家村”)拜访了俄罗斯作家协会前主席, 俄罗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果戈理研究专家伊戈尔·佐洛图斯基(1930年生), 与后者就俄罗斯文学诸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 现将谈话内容整理如下。

关键词: 伊戈尔·佐洛图斯基; 果戈理; 俄罗斯文学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任: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4年过去了, 我记得上一次与您见面是在2003年莫斯科召开的“索尔仁尼琴: 艺术创作诸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您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评论家, 我阅读过您的许多著作, 关于您的评论也很多。您的文学批评文章尖锐犀利, 评论到位, 我很喜欢读您写的东西。但我感兴趣的一件事情是, 有人撰文说上个世纪70年代, 您在《抉择时刻》一书中曾经与如今当红后现代主义作家维克多·叶罗菲耶夫进行过争论。

佐: 我在这本书中并没有与叶罗菲耶夫进行争论。而是我去年出版的一本书, 叫做《从格里鲍耶多夫到索尔仁尼琴》一书中有一篇文章, 其中特别提及了叶罗菲耶夫以及他的“理论”, 因为他以此理论为基础摆出一副评论家的姿态。叶罗菲耶夫的理论是这样的: 人天生是群居动物, 人身上的恶大大超过人身上微小的善。他本人是这样对我说的, 亦是这样写的。他还出版了一本作品集, 叫做《俄罗斯恶之花》。

任: 这本书已经被译成中文, 还有他的小说《俄罗斯美女》也已译成中文。

佐: 我很难理解, 一个拥有着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竟然会翻译叶罗菲耶夫的东西, 这很可笑。对于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而言, 叶罗菲耶夫很渺小。

任: 另一个叶罗菲耶夫, 即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的作品很多也已被译成中文, 许多中国读者熟悉这位俄罗斯作家。

佐: 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并不是蠢人。他研究人身上的恶, 而且认为自己研究得很深。正像他自己所说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研究透人身上的恶, 我的炮弹击入得更深一些。”可他将人的外衣脱去, 让人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恕我直言, 他甚至将自己隐秘的性生活详尽地描写出来。我曾对他讲过: 你这是在用泔水桶汲取东西, 然后将其抛掉, 你以为你舀到的就是人的内心深处, 不是的, 绝不是。若要摆脱束缚、寻求自由(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 不要一下子抛弃一切规范。让我们脱去女人的外衣吧, 让我们揭示出一切秘密吧! 在这一方面, 叶罗菲耶夫是排第一位的。他以为, 当他剥去人的这些外衣的时候, 也即揭开了人的所有秘密。为什么要把身体的东西描写得那么详尽呢? 不仅是他一个人这样做, 整个当代文学都是这样, 它把人变成了一代“新人”, 一代急不可耐地扑向恶的洪流的“新人”。事实上, 这只是

一种污泥浊水的洪流。当然，这是一种疾病，文化的疾病，更是一种文学疾病。您知道疾病只可能有两种结果：或者死亡，或者治愈。我希望，这种疾病最终能得以治愈。我将这本书赠与您（这时，佐洛图斯基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从格里鲍耶多夫到索尔仁尼琴》递给任光宣），在这本书中，有我在索尔仁尼琴获奖仪式上的答词，从中可以看出我是如何看待这个奖项的。

任：您毕生研究俄罗斯文学，根据您所做出的贡献，应当得到奖励和高度的评价。据说，您之前并不知道将要授予您这个奖项？

佐：是不知道。我与索尔仁尼琴的关系并不是很近，我曾写过一些关于他的文章，都比较严苛。我很尊敬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要对其俯首称臣。我写了他，写他的回归，他的戏剧性结局，他回来得太晚了。他在美国几十年所做的一切，我所指的是他努力搜集整理小说《红轮》所需的资料，在档案馆辛苦地查找资料，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动，耗费了他多年的时间。而这一切在苏联解体后瞬间就完成了，因为档案大都已解密。如今，人们已了解到这些档案的内容。因此，他作品的最大价值并不是小说（特别是《红轮》）本身，而在于小说包含了曾不为俄罗斯人所知的史料。然而，现在他的作品所涉及的史料对我们已不再是秘密，他的这部有关革命历史的小说对于俄罗斯读者就不再那么需要了。我认为索尔仁尼琴作为“数学家”，无法准确地计算历史的变迁。这本书（《从格里鲍耶多夫到索尔仁尼琴》）里有关于索尔仁尼琴，还有关于果戈理的文章，其次，还有一篇文章是评论沃伊诺维奇的一本书的。

任：沃伊诺维奇去年来过中国，我对这位作家的观点比较熟悉，他对索尔仁尼琴不感兴趣。据说他如今常年居住在国外。

佐：是的，他时而在莫斯科，时而在慕尼黑。他写了一本书——《在神话背景上的肖像》，这本书已出版（莫斯科，爱克斯摩出版社，2003）。他写道：索尔仁尼琴是这样一个人，他欺骗了所有的人。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作家，他甚至取悦西方的电视观众。他陷入了西方，周围都是一些否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物。他去了哪里？他处于什么样的人群中？那里有西尼亚夫斯基，萨霍夫斯卡娅。简言之，这是一本充满恶意之书。我针对这本书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带着空的腰间暗兜》。要知道，一个人若想与索尔仁尼琴“决斗”，需要知道很多东西，需要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要很好地熟知俄罗斯的历史。而沃伊诺维奇是不了解的，美国的大学不得不要他离开，因为他除了说苏维埃政权很坏，什么都不能给予美国人。而这一点，对美国人而言是毋庸赘言的。我的评论很尖刻，您将看到我文章中对他书中言论的引证。虽然我们曾经是不错的朋友。

任：你们过去私交不错，那如今他对您的评论作何反应呢？

佐：因为他所写的不是事实，他的书实在是一本恶意讽刺之书，因此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他的什么反应。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当得知获得“索尔仁尼琴奖”，我异常地震惊。我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并不是逢迎之词，我不是索尔仁尼琴的“御用”评论家，我甚至从来没有到过他的家中。我先是结识了他的妻子，稍晚些才结识了他本人，那是一次很短暂的相会，在某个授奖仪式上。

任：索尔仁尼琴本人亲自出席那次以他名字命名的授奖仪式了吗？

佐：没有。最初的几次都是他本人都亲自授奖的。然而，他如今毕竟已80多岁高龄，身体多有不妥，所以2005年授奖于我时，他没能出席，但是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他的妻子纳达利娅·安德烈耶夫娜代他在授奖仪式上当众诵读。我还保存着这篇文章，它曾刊登在《文汇报》上。这是他关于授奖所发表的最后的文字，此后他便封笔不言了。当然，于我而言，获奖那一天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我非常尊敬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他是俄罗斯当今毫无疑问的、独一无二的伟人。我所指的并不是作为文学家意义上的他，而是指他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个体而言。当人类走出了所有的体系与框架之后，其实可以说是以沉重的代价摧毁了这个体系，在他之后明白了这一点。当他返回俄罗斯后，我曾邀请他到电视台做客。我在电

视台工作，主要是拍电视片，现在正在拍一部关于果戈理的电视片。我邀请了他，但是他没能来，我同他通了很久的电话。他说，他很绝望，因为他看到了这一体系崩塌所导致的后果，这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

任：有些人认为，索尔仁尼琴不仅仅是作家，思想家，还是一种现象，一种文化现象。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佐：我想说，历史的标尺掩盖了他的作品的纯文学价值。他是一个作家，他曾写出过一系列优秀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著名的自传性小说《牛犊顶橡树》。虽然我无法将他与19世纪伟大的作家——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量齐观，但是我仍想强调，索尔仁尼琴是当今时代的一个伟人，一个有思想深度的人，一个严肃的人，作为一个文学家、政论家，而不是艺术家，他做了很多，可以说他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另一方面，不可回避的是，有人认为索尔仁尼琴是最高意义上的全面否定主义者。然而，恰恰相反，他认为应当重建俄罗斯。他早就在考虑如何重新建立俄罗斯，而不是像现在的一些实用主义的民主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们那样主张摧毁一切，他们至今还在破坏着，特别是在埋葬过去的一切。如今，许多人竟会因为自己的父辈们帮助欧洲赶走了法西斯而感到羞愧。

任：这是不公正的！

佐：的确，这是不公正的。我曾亲耳听到过莫斯科电台的某个广播节目，一个评论家像梅菲斯特一样说道：我为自己的祖父感到羞耻。他的祖父曾经是一名战士，参加过解放波兰、匈牙利、德国等国家的战争。这些士兵有什么错？什么报应？他们又因此得到了什么？我们知道战后俄罗斯的生活是怎样的，特别是乡村的生活。您知道吗，现在出现了一种全面的虚无主义，这是你们无法理解的。我们没有邓小平那样的人物，俄罗斯需要这样的伟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俄罗斯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需要邓小平式的人物，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推动我们的国家稳步地发展。俄罗斯正处在历史残骸上，文学亦是如此。新一代文人们彻底断绝了与过去的联系：他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不透人身上的恶，托尔斯泰在他那个时代只是一个传教者，而我们不需要任何传道。他们只需将现有的一切展示出来，就足够了。这种现象很糟糕，请看一看吧！他们是什么立场？！请闻一闻吧！这是一种难闻的气味，这与伟大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学立场相矛盾。新一代文人们正如俄罗斯新思想的创造者们一样，都是无神论者。在我看来，上个世纪所发生的革命，其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们都不信上帝。如今，我们得到的就是这样一群孩子们，他们只知道探求人身上原初的撒旦精神。虽然人身上存在着神性的光芒，然而他们并不感兴趣这一点。他们感受不到这一点，所以也无法将其写出来。这只是我的观点，我们现在感染了疾病，很严重的疾病，我再重复一次，这种疾病只可能有两种结果——治愈，或者死亡。没有第三条路！

任：您刚刚提及了宗教、精神价值，六十年代，您对乡村作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写了很多关于他们的文章，您认为正是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创作中复活了东正教精神。

佐：更准确地说，是基督教精神，并没有非常严格界定的东正教。果戈理很像丘特切夫。顺便说一句，我正在拍摄一部关于果戈理的电视片，我暂时不打算揭开我的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鲍耶多夫等其他一些俄罗斯的伟大作家，他们非常清楚天主教堂的意义，他们认为天主教的教堂用人的位置取代了上帝，更加适应人的需求。果戈理则更深刻地认识到，罗马神父使人变得无力、软弱，其目的在于让人明白，他们是神父，人们需要的是他们，而不是宗教，这是一种完全世俗性的宗教。虽然果戈理曾在天主教的教堂里祈祷，因为上帝、耶稣只有一个，在这个意义上说，并没有严格区分开来的东正教。但是当两个波兰神父建议他改变宗教信仰的时候，他拒绝了。果戈理很喜欢这样一句话：“难道不想感受一下几个带有否定意味的词汇吗？”丘特切夫亦是如此。他在西方居住了22年，对西方有着深入的理解，写过此类文章，如《关于罗马教皇的罗马》等等，尖刻地批评了天主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敌意。我们仍可以相互信任，相互合作。

任：您曾说，果戈理在 60 年代拯救了您，该在怎样的意义上去理解您的这句话？

佐：我曾经从事当代文学评论，然而，当代文学在我身上激起的兴趣是不可能不断持续下去的。我想探求一种更为重要的，全局性的东西。我想了解自己，了解时代，了解生活。我坚持我的文学活动，我没有任何技巧，没有任何经验，没有进行任何与档案相关的工作，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我只是一个活着的评论家。我放下这个工作近十年，开始访问基辅、彼得堡、莫斯科的档案馆，阅读果戈理的手稿、信件。果戈理帮助我选择了惟一的一条道路，也是他自己所走的道路，我感谢他，当然还有别人，但起到最重要的影响作用的是果戈理，我走上了他所走的那条接近上帝的道路。果戈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拯救了我。

任：那么，您在此之前是无神论者吗？

佐：我从不曾是无神论者，虽然我出生于一个无神论的家庭。我的父亲曾经多次到过中国。1927 年，他作为一名政治间谍，见过汪精卫，毛泽东，之后还见过蒋介石。曾任驻中国的间谍头子。他是政治间谍，因此能够与这些人会面。他去过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待了很久，而我却从未去过中国。我曾经在中国的近邻地区生活过。中学毕业后，我在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工作，教俄语与俄罗斯文学。之后在报社和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便离开了。如果您读过我的简历，那么您大约知道我的父亲曾于 1937 年被逮捕，他经历过严峻的人生大学校，那是一种真正的折磨。他被关在一所著名的监狱，但他没有承认任何东西，所以他幸存了下来，因为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他有罪的证据。他是一个军人，1924 年毕业于总参指挥学院。1939 年他与另外两个人因间谍罪而被判处八年徒刑，尽管没有任何证据。重要的是，他没有承认自己有罪。我曾经读过他的卷宗，并写下了一本关于我的父亲、母亲的书籍。我的母亲于 41 年被捕，因为她是间谍的妻子。她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生活了十年。母亲被捕后，当时只有 10 岁的我被关进了位于莫斯科丹尼洛夫斯基修道院的儿童监狱，全称是“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分管集中营的儿童收容所”，现在那里是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教区外事部。我在那里并没有待太久，一个月之后警察就将我送到了儿童院，虽然短暂，我还是尝到了监狱的滋味。之后儿童院撤退到西伯利亚，我们又从儿童院逃走了。

任：这真是一场辛酸的人生经历啊。

佐：是的。我这个年纪的人很多都有类似的经历。赫鲁晓夫当政后，我的父母得到平反，我的父亲现在葬在“新处女地公墓”。

任：在新处女公墓的哪一个区？

佐：不在墓区，没有墓碑，骨灰安放在墙穴里。不管怎样，是在新处女公墓。母亲葬在另一个地方。一句话，这样的经历对于我那个时代的人是很典型的。每每回忆起过去，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的父母曾经被关在监狱里，而则我毕业于列宁就读的那所中学——以乌里扬诺夫命名的中学，是命运将我带到了那里。

任：我只是听说您在西伯利亚生活过，在那里读了中学，之后又在那里教过书。

佐：我在那里读的中学，在第一所男子中学。此外，我还获得了银质奖章，并被保送入喀山大学。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反常现象。我的父亲于 1944 年被释放，1951 年又再次被捕，当时我还在读大学。我并没有被赶出学校，虽然我被调查局叫去，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КГБ），而是国家安全部（МГБ）。他们说，你的父亲是革命者、还是间谍，请你证实一下吧！他们从我这里什么都没有得到，我告诉他们：我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人，我爱他。他们对我无计可施，也没有把我关起来。

佐：我父亲在任何审讯记录上都没有签字，母亲也是这样，我有如此伟大的父母亲，我很自豪。接下来，您大约都知道了，我很荣幸地移居到作家村。您还感兴趣些什么呢？

任：您认为俄罗斯文学是东正教文学？还是基于东正教基础上的文学呢？

佐：不是的，不能说俄罗斯文学是东正教文学，这样表达不准确，而应该说俄罗斯文学

是基督教文学。早在普希金那里就已经感受到了基督教的吸引力，然而，只是在他生命的晚年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要忘记，普希金曾写过渎神的长诗——《加百列颂》¹，他在这部长诗中嘲笑了处女马利亚。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写下了《先知》，这并不是徒然的。

任：据我所知，好像他写《先知》一诗时还不是他生命的晚年，是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

佐：虽不是在生命的最后，也算是他创作的晚期了。其中有这样两行诗句：连根拔掉我罪恶的舌头，那好说空话又狡猾的舌头。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并忏悔自己曾在诗中渎神。最终，他朝着上帝的方向走去。他还曾写过一些诗，如《香客》、《我是荒原上自由的播种者》、《无用的馈赠，偶然的馈赠》，等等，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认为宗教是惟一的出路，虽然他也曾说过：我白白地跑向锡安山的山巅，/贪婪的罪孽紧跟在我身后追赶……普希金认为文学不应走出艺术的范畴，而果戈理将一切都打破了。他走出了艺术的范畴，写下了《与友人书简选》，从果戈理开始，出现了真正的基督教的俄罗斯文学，列斯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着他的探求，顺便说一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而言很特别，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怀疑要甚于信仰，接下来则是托尔斯泰，等等。

任：那么20世纪呢，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否具有宗教性特征？

佐：20世纪，20世纪出现了无神论的倾向，这种倾向渗入到文学当中。但我觉得苏维埃文学比如今的继承者要更加接近基督教理想。我们通常认为，白银时代——您作为一个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一定很清楚——是艺术的繁荣时代。然而，这也是艺术堕落的时代。难道不是吗？毕加索是什么？著名哲学家谢尔盖·布尔加科夫于1909年，正是白银时代的繁荣时期，写了一篇关于毕加索的文章，叫做《美尸》。毕加索的那种“色彩创造”的影响毫无疑问地伴随着整个白银时代，如索洛古勃，巴尔蒙特的作品，甚至包括勃洛克的一些诗作，这些诗此后令他很伤心，因为在这些诗中他继承了《加百列颂》一诗的传统，嘲笑处女马利亚，说天使与她发生了肉体关系。勃洛克曾经赞同这种对神的亵渎，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他克服了这一点。

任：您是指在十月革命后吗？

佐：是的。他克服这一点比较晚。他认为革命可以洗净罪恶，不是我们的罪恶，而是他们的罪恶——贵族们的罪恶，在人民面前他们是有罪的。当他看到所发生的一切，看到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在他的弥留之际，他面前放着福音书以及《与友人书简选》，他说：我们都在走向这本书。这就是临终前的勃洛克。勃洛克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虽然他也曾感染过“毕加索”那种时代的疾病，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天才，他走了出来。接下来便开始了绘画、文学的衰落——《美尸》。

任：您刚刚提到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我在电话中与您讲过，我已于1999年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且我的译本是该书的第一个中译本。您在您的《果戈理传》中也写到了果戈理，并就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问题与别林斯基进行了辩论。我想问，在把别林斯基奉为圭臬的苏维埃时代，您怎么敢与这位文学巨匠进行辩论呢？是怎样的动机促使您那样做的呢？

佐：其实动机很简单，我明白了果戈理的真理。我深入研究了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前30年，以及19世纪前半期的文学，我阅读了大量未曾接触过的东西——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以及一些神学著作，阅读果戈理的作品达十次之多，所以我深深地意识到别林斯基的一些观点是不正确的。我很尊敬别林斯基，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别林斯基是一个文艺批评家，曾写过一篇美文，如《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果戈理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不是对修道院长，对某些官员的嘲讽，而是对生活本身喜剧性的嘲讽。为什么？因为人开始于希望，却结束于死亡，喜剧不过是悲剧的先兆。但别林斯基又是这样一个人：他性情暴躁，容易受他人思想的影响。他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虽然他曾上过大学，也的确也阅读了许多东西，然而，他所阅读的都是当代文学

作品。他时而学些这个，时而学些那个，没有自己系统性、全局性的想法。他能敏锐地捕捉到文学的动机，因为他很有天赋；但是将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提升到一定高度，他却做不到，他缺乏这方面的资质。他也曾信仰过社会主义。

任：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毕竟是 19 世纪几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我们在研究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时无法绕过他们。

佐：当然，撇开他们是不行的，他们的确存在过。然而，还有其他一些评论家，如格里高利耶夫，纳杰日金，什维廖夫，等等，还有许多作家最后也成了非常优秀的批评家。比如，果戈理曾写过一些关于俄罗斯文学的优秀的评论文章，普希金也是一个批评家。别林斯基等人并不是惟一的文学批评家，过去我们却赐予了他们“惟一”的称号，而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哲学批评也仅仅始于 19 世纪末期。俄罗斯哲学是存在的，它已经走出了文学的框架，基督教文学的框架。索罗维约夫、别尔嘉耶夫，弗罗连斯基等等，他们都走出了文学的框架。杰尔查文有一首著名的对上帝的颂诗，该诗在其生前被译成 44 种语言，广为传唱，这是一首普希金永远都无法写出的伟大颂诗；大祭司阿瓦库姆，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但是谈及世俗的基督教文学，则起源于果戈理，此后托尔斯泰坚持了这一传统。

任：您认为谁最直接地接过了果戈理的接力棒呢？

佐：首先应该是列斯科夫。中国人知道列斯科夫吗？

任：中国人对列斯科夫的看法比较正面。不久前我们出版了《俄罗斯文学简史》，我是该书的主编，我们的书中列专章介绍列斯科夫。

佐：然而，欧洲却不了解列斯科夫。当然名字是听过的，却没有人研究。列斯科夫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任：是的，只是以前没有正确的评价他。

佐：我认为还有丘特切夫。

任：丘特切夫在我们的书中也有专章论述。

佐：非常好。我在欧洲、美国做过多次讲座，那里有许多斯拉夫研究者，其中不乏有才华，有教养的人士。然而，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白银时代，而不是列斯科夫，丘特切夫。他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比他离开俄罗斯的时候更具有俄罗斯人的特质。我曾经拍过一部关于丘特切夫的电影。

任：什么时候？

佐：2003 年。丘特切夫诞辰 150 周年。我们去了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不管怎样，你们知道丘特切夫。但是在欧洲对他的了解得很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洲而言则是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全部。阿波隆·格利高里耶夫曾说过：普希金是我们的一切。不久前召开了一个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讨会，我也参加了，根据委员会的建议，我应当说些什么。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想说，他绝不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还有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列斯科夫，等等。欧洲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地关注，其原因在我看来有两个：一方面，他更早期地打破了革命的幻想；另一方面，他深入地探讨了人身上恶的根源。托尔斯泰说得对，不经过斗争就不能为一个人树立丰碑，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适用。因为他还没有在基督与撒旦之间做出选择，没有，因而他才能够无畏地批驳福音书。还记得《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吗？宗教大法官的独白坚定而富有说服力，基督则在沉默，这亦表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怀疑。他有时甚至会陷入否定的深渊，当罪恶攫取住人的时候，他是如此的享受。这是多么的不幸！他为此所吸引，同时他也因此而吸引着我们。还记得《作家日记》这部作品吗？其中描述了墓地中死人间的对话。男人为女人所吸引，恐怖的交谈，一种地下世界的恐怖！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墓地所吸引，认真地讲我是反对这样的。我更倾向于一种明快的、尘世的、光明的东西。当《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承认索尼娅·马尔美拉托夫的

真理时，他是在睡梦中呓语；当我们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不能不承认关于老卡拉马佐夫情欲的描写是令人震撼的，关于斯梅尔嘉科夫，对罪行，反常，否定的描写是那么深刻。而光明、神圣的人和事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显得苍白无力，尽管他曾为此努力过。而列斯科夫是一位更多地表现俄罗斯人身上光明东西的作家。

任：您是指他的小说《大堂神父》？

佐：是的。除《大堂神父》外，他还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稻草人》、《不死的戈洛万》、《天使的印记》、《着魔的漂泊者》。在他之前，一些俄罗斯作家也曾想过描写人类身上美好的东西，甚至是神圣的东西，但列斯科夫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作品告诉读者：这样的人，这样的东西在俄罗斯是存在的。

任：您现在研究列斯科夫吗？

佐：我很喜欢他，我写了一些关于他的文章，但是我此生所剩时间无几了，我很想写一本关于列斯科夫的书。您知道，我花费了十年时间研究果戈理，如果再研究列斯科夫，所需的时间可能不会少于研究果戈理的。列斯科夫生活在另一个时代——19 世纪下半叶。列斯科夫卒于 1895 年，那时的列宁已经 25 岁。

任：据说您离开了莫斯科作家协会？原因何在呢？

佐：不是离开的，而是被开除的。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一切都解体了，其中也包括作协。在苏联只有一个苏联作家协会，这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机构。作协里有一些官僚，非常清楚自己的“事业”。什么事业？那就是如何保证作家的住房，医疗，出版书籍。这是苏维埃时期的一个机构，依附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家们所出版的书的利润都纳入国库，一切都是依靠作家的劳动建起来的。作协下设许多机构，医院，诊所什么都有。然而，一切都解体了。起初，作家按照意识形态原则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激进派，民主派；另一派是保守派，传统派，他们反对民主。叶甫图申科当了民主派作协主席。他上任后解散了一切，驱赶了一切，之后他自己也离开了，去了美国。这就是我们的“民主派”。我曾经对他说：为什么要离开呢？你把一切都破坏了，至少要收拾一下残局吧。他说：我缺钱花，我有很多孩子。我们曾聊过一个半小时，我对他说：热尼亚²，留下吧，你是搞文学的，你爱写诗，你随便打开哪个办公室的门都能谋个职位，哪怕是做《文学报》主编呢！但是他说：不，我要去美国，我需要钱。于是他去了美国。他在那里教书，在美国某个边远的地区教书。叶甫图申科在那里讲授俄罗斯文学，大约有两、三个学生。他已经拿到了绿卡，有时也回到别里杰尔金诺，只是在夏天，这里有他的别墅。

任：您还没有回答我，您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作协开除的？

佐：苏联作家协会解散后，留下来巨大的财富，但是没有明确的继承者，任何人都可以吞食，攫取作协的财富。那时我还很年轻，被推选为俄罗斯作家协会的代表，民主派的代表。我认为我们应当保护好这笔财富。于是我们坐下来谈判，我们只想做一个保护者。最终谈判没有任何结果，我们丧失了一切，我也被开除了。这之前并没有人通报我被开除一事，我还是从报纸上知道这点的。

任：那您现在是俄罗斯作家协会（Сою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会员吗？据报道，您还是俄罗斯作家协会的联合主席之一。

佐：也不是，我先是被莫斯科作家协会开除，之后又被俄罗斯作家协会开除。如今，俄罗斯作家协会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机构。我现在对此并不感兴趣。俄罗斯作家协会过去还有些意义，它曾经能够帮助作家。现在，我只能再重复一次，他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组织而已。是的，我曾经做过俄罗斯作家协会的主席。是年轻人们请求我做的，那是一个没有任何收入，名誉性的职务，只是需要我的大名而已，但我们还是做了一件事。1996 年我们在雅罗斯拉夫召开了全国青年作家会议。我们拜访了叶利钦的助手，之后叶利钦给我寄来了一封

带有他亲笔签名的信，这封信现在我还保存着。他表示支持这次大会，我将这封信拿给切尔诺梅尔金（当时的政府总理），我们便得到了一笔汇款。人们从各地赶来参加会议，甚至有人还卖掉了自己的牛以凑足路费，当然，此后我们支付了他们的费用。那是一次真正的会议，与会者都是一些真正的作家，如：诗人契洪采夫、阿纳托里·金、马卡宁，等等。

任：现在在俄罗斯有两位文学评论家比较活跃，一个是爱国派阵营的弗拉季米尔·邦达连科，另一个是民主派阵营的谢尔盖·丘普里宁。您怎样看待这两位文学评论家？

佐：我读过谢尔盖·丘普里宁的一些文章，我看不起他。俄罗斯解体之后，他便扑向俄罗斯经典文学，要埋葬俄罗斯经典文学。他证明道：俄罗斯所发生的不幸正是俄罗斯文学的罪过。他断然否定俄罗斯的经典文学，这就是他的论纲。他是一个破坏者，怎么可能对他有好的看法呢？邦达连科是一个“武打者”，他不是评论家，而是一个士兵。我很了解他，因为他曾经参加过我的讨论班。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莫斯科作家协会举办创作研讨班。他来参加我的讨论班，我不能说他是我的学生，因为此后他走上了评论家的道路。他出版了许多书，还是《文学日报》的主编，我对他的看法并不像对丘普里宁那样。邦达连科是一个光明的土壤派人士，而丘普里宁只是柏油马路的填料。邦达连科类似于某种政党的报幕员，这种政党所代表的正是我们过去的共产党员。当然，他在写评论文章，但于我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思想的表达需要一定的规则与条件。如果不能很准确地描写，那么这种思想也就不确切。我很看重写作的技能和写作艺术，只有那些杰出的人物才能够真正地写作。

任：您是果戈理研究专家，您1979年在苏联出版的《果戈理传》在第二年就被译成中文（佐洛图斯基认为他的这本书是以“盗版手段”译成中文的，因为至今他没有得到任何版税费，也没有人正式告知他的书被翻译出版）与中国读者见面。如今，您是果戈理诞辰二百周年纪念（2009）活动的主要策划人和组织者，我们知道届时俄罗斯各地都会举办庆祝活动，这一年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果戈理年”。我们知道您如今很忙，但这并没有影响您的创作活动，您不断推出新作，我们已看到您的新作《果戈理的笑》（2005）和《从格里鲍耶多夫到索尔仁尼琴》（2006）。果戈理认为他的创作天赋是上帝赐予的，是上帝的馈赠。您的写作才能是否也是上帝的馈赠？

佐：是的，写作才能是上帝的馈赠。果戈理多次誊写、修改自己的东西，常常不满意自己的创作。如果说他在《与友人书简选》中对他人提出了很高的希望，那么可以说他对自己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在那本书的开篇他就说自己比所有人都要差，他说：“我身上聚集了一切可能有的卑鄙，每一种数量都不太多，然而我至今却又未在任何人身上发现有这么多。”在俄罗斯作家之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评价自己，当然，托尔斯泰也曾在日记中讲过类似的话。

任：我读过您的《我离开了这种体裁》一文，您在文中解释自己如今很少写文学评论文章时是这样说的：“她（指文学评论——笔者）开始失去听众。我不习惯为两三个友人写东西。如今有谁在看评论文章？是写评论文章的评论家。是评论家的朋友。还有评论文章评论的那个作家。”您离开文学评论这是您的权利，可我最最后想问问您究竟怎样看待当今的文学评论？

佐：您知道现在文学评论出现了怎样一种现象吗？在俄罗斯，文学评论始终是文学的孪生姐妹，他们是并行不悖的。文学评论以自己的分析进一步丰富了文学本身。它是文艺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文学科学，文学研究出现于20世纪。说实话，我并不喜欢文学研究家这个名词，我也从不曾称呼自己为文学研究家。我认为文学批评是艺术性的，文学评论家也需要有天赋，文学评论家的才能——是文学天赋加真诚，虽然不一定像作家那样具有非凡的天赋，那样的话，评论家也可以写小说了。但他要具有作家一般敏锐的触觉。因此，伟大的俄罗斯评论家也应是伟大的天才。19世纪是没有文学研究家的，文学作为科学出现于20世纪。人们开始解构文本，有如俄罗斯童话故事中将人切成了碎片。可是如何将这碎片重新整合呢？于是就出现了“活水”，将活水洒在碎片上，人便复活了。然而，之于文学，被打碎后，

活水却无法将其复原。评论成了私人性的东西，过去它却是社会性的。文学评论曾经也有自己的读者群，在文学爱好者与评论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反馈关系，现在，却只有作家才读评论，而且是针对自己的评论，还有评论家的朋友及亲人，崇拜者都未必。文学评论所能影响的范围缩小了，变成了室内的、私人性的。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依然认为，文学评论是为大众所写的，它应当为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喜爱。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评论应当降低品位以俯就大众，相反，它应该提升自己。今天的文学评论已变成了一种私人性的东西，如同进了保险箱。到处都充斥着拜金主义，文学评论也只是一种赚钱的工具。作家走过来对评论家说，我付给你多少钱，你要多加宣传、赞美我。全世界都是这样。文学评论应当是独立的，我很高兴，我没有成为索尔仁尼琴的“御用”评论家，我可以说我所想说的，但我仍然很尊敬他。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他作家，我与许多作家相识，都是很好的朋友，如阿勃拉莫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等。评论家应该是独立的，可是如今，这样的评论家没有了。倒是有一些放纵的、无耻的评论家，他们或是极力贬低某个作家，或是尽力抬高某个作家。这一切都发生于俄罗斯文学生活之外。文学评论家常常走出一本书，或是作品的框架来考察自己的生活。否则，为什么要写评论呢？！研究那些隐喻，修饰语，都是无趣的！

任：谢谢您。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非常感谢！（王帅根据录音整理翻译）

附注

1 他的《加百列颂》把神从空中拉到地上，赋予神以人的七情六欲，（“马利亚在自己安静的一角/静谧地躺在揉皱的床上，/心儿燃烧，欲火又以温柔的炽热/跃动着她那年轻的胸膛。/她在轻轻地呼唤加百利，/为他的爱献出隐秘的馈赠。”

2 叶甫图申科的名字叶甫盖尼的爱称。

The Interview with Igor Zolotusky

REN Guang-xuan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n 4th August 2007 professor Ren Guang-xuan of Peking University visited Igor Zolotusky (born in 1930),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Russian Writers' Association, the famous literary critic and the expert of Gogol, who lives in Beredelkino (also called writers' village) in Moscow. Professor Ren and Igor Zolotusky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on many problems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e conversation is recorded as follows.

Key words: Igor Zolotusky; Gogol; Russian literature

收稿日期: 2007-11-09

作者简介: 任光宣(1944-), 河北怀来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锟]